

大龙邮票发行前后的那些事

1878年,在清廷海关的筹备运作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今年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学者赵岳赴英国查找资料,因偶然的机缘在英国邮政博物馆发现了一批重要档案,涉及1877年清廷海关与英国印刷商德纳罗公司的往来信函等大量史料,特别是德纳罗公司1877年6月18日向清廷海关提交的42页专题报告。这些档案再现了140年前清廷海关与英国德纳罗公司为筹印邮票的工作交往,理清了大龙邮票发行前的诸多历史细节。



“烟台谈判”后启动了邮票印制工作

鸦片战争之后,多国活跃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为了扩张势力,争相私设“客邮”。面对列强横行,主权受侵,朝野上下呼声颇多,但囿于条件所限,一时未寻得可行之法。同治五年(1866),海关涉足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承办的邮件递送业务,为海关内部及在华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服务。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邮政现代化的帷幕就此徐徐拉开,过程之中最为重要的转折契机,便是轰动一时被称为“滇案”的“马嘉理事件”。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职员马嘉理在接应英方探路考察队时,在云南边境被当地居民打死,事件震动朝野。围绕着原因调查、善后赔偿、扩大贸易等一系列问题,清廷与英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曲折,险开战端。

谈判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两国代表,利益较量之中,数度陷入僵局。最终,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成了双方调停的不二人选。赫德于1854年来华,1863年被清政府派任为海关总税务司,其后连续任职48年,任内为清廷创建了税收、统计、港务、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

赫德在接受调停的委托之后,积极斡旋,希望尽快解决争端。因为他明白,如果双方开战,作为清廷海关外籍雇员的他,即使不被驱逐,也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于是,赫德建议双方到烟台面对面进行谈判。此次危机关之中,赫德精明凸显,一边静观事态发展,一边积极筹谋自己的计划。

赫德所盘算的计划,便是将其筹备的“官信局”和“官银号”事项写入条约草案,

筹印邮票有中英两种方案

收到金登干转发的询问后,德纳罗公司于1977年6月8日出具了一份42页的机密报告,详细讲述了邮票的制造工艺、油墨特性以及防伪工艺等一系列涉及邮票印制的技术问题,报告中还附录了12份附件,其中有为清廷海关设计的纸张水印图稿、邮票图稿、邮资信封图和信封专用邮资符图稿,这就是“英国方案”——英国设计、英国印刷。

“英国方案”通过信函发往中国,10月25日,赫德回函金登干,对于“英国方案”的优劣没有加以评述,但明确表明将会在英国印制邮票。可随后又并没有给予下一步行动的确切指示,为此金登干两度发函催问,但一直未果,直至1878年2月24日,赫德电报金登干:“请推迟发出邮票订单。”清廷海关在伦敦筹印邮票以及与德纳罗的合作宣告失败,“英国方案”也就此胎死腹中。

其实,在“英国方案”推进的同时,“中国方案”也在积极谋划之中,所谓“中国方案”,就是“中国设计、中国印刷”。1877年3月,德璀琳向赫德致函汇报购买设备在中国印制的计划:“向英国订购印制邮票的工厂设备,并将印制任务暂时委托造册处负责……我已呈交各种邮票图案。”5月,赫德批准了德璀琳的计划。7月初,德璀琳通过金登干与德纳罗公司商讨过邮

票印制设备物资的采购问题,但计划遭到了德纳罗公司的打压,德纳罗表示在中国印刷技术难度大,建议先在英国印制,待时机成熟再向中国转产。

为了尽可能争取到这项业务,德纳罗公司亦退让一步,声称如果不认同他们的设计,不妨由中方提供设计图,再交德纳罗印制。因此在1877年11月份,德璀琳将中方设计的“蹲伏的龙、凤凰、背驮万年青的大象和宝塔”这4种邮票图样寄往了英国,谋求“英国方案”与“中国方案”的折中融合,即“中国设计、英国印刷”,但随着赫德后来的突然叫停,这种设想也无疾而终。在英国印刷无法落实的情况下,邮票印制方案又折回“中国设计、中国印刷”。

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函海关造册处代理处长夏德,请海关造册处帮助印制邮票,指示按所提供的邮票样张图样及文字修改,印制面值银三分和五分的邮票各10万枚,颜色建议五分银用黄色,三分银用红色。7月15日,夏德寄给天津的德璀琳500张,共计12500张面值五分银邮票,并表示其余的邮票将在次日完成,但还需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上胶和打孔工作。这批邮票于7月24日运抵天津,并随后向公众出售。自此,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华丽登场。

烟台谈判后,海关启动向公众开放邮递业务的筹备工作,赫德要求各地税务司为此建言献策,其中以1864年到海关工作的德国人德璀琳颇为积极。德璀琳先后在宁波、镇江、淡水、厦门、烟台、天津等地海关任职,任内积极推进中国邮政的开办,后来成了大龙邮票印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1877年3月5日,德璀琳向时任清廷海关驻英国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致函,询问在英国或中国印制邮票的花销。信件送抵英国后,金登干向英国著名邮票印制商托马斯·德纳罗公司咨询建议。德纳罗公司创始于1813年,1845年开始为英国政府印制邮票,曾为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服务。

1877年德纳罗档案为学者赵岳首次在英国伦敦所发现,他在整理、翻译、研究的基础上,辑集成《德纳罗密档:1877年中国海关筹印邮票之秘辛》。这部档案资料除了清晰呈现清廷海关为推动筹印邮票的“英国方案”而与德纳罗公司的一系列的合作进程外,还涵盖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线索。

在德纳罗公司关于西方印刷技术的报告中,该公司详细回答了清廷海关关于印制邮票成本费用、的询问,内容包括了印刷工艺、防伪技术、油墨使用、物资配备、邮戳销盖等系列情况。关于印刷工艺,德纳罗公司向清廷海关介绍了4种印刷工艺(凹版、平版、压花和凸版)的技术手段和特征,并讲解了这些技术的作伪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获得清廷海关的青睐,德纳罗将他们的看家本领——改良型的凸版工艺也进行了汇报。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印刷商,德纳罗公司关注的印刷技术无疑代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这些述之成文的报告为研究19世纪邮票印制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信息。

德纳罗档案中,还收录了一张翻拍的钱币照片和一幅黄色基调的三角形“龙”图,通过对钱币资料的研究,赵岳得出钱币照片为长期存在争议的关平两制银币“中外通宝”照片的结论。“中外通宝”钱币是钱币研究领域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课题,其中一项就是年份断定。目前钱币研究中普遍认为“中外通宝”出现的最早年份为1878年。而这次“中外通宝”照片出现于德纳罗档案,可将“中外通宝”实物出现的时间提前,即为1877年。另外,通过对比研究及文字记载,“中外通宝”的其他历史价值值得挖掘:“中外通

德纳罗档案的三个发现

宝”与英国政府特许银行丽如银行存在着某种联系;德纳罗公司在为清廷海关设计邮票时把“中外通宝”作为参考,合理地解释了赫德所推崇的“海关印记”太极阴阳图案置于“中外通宝”中央的原因。

关于德纳罗设计邮票的另一份参考资料——三角形黄底“龙”图,经过研究发现,该图从旗形、龙态以及龙珠的位置来看,是当时大清三角官旗,系金登干1874年应赫德要求在伦敦制作、用作海关船只标识旗。此后,金登干致函赫德,告知已寄运小旗样品,大旗样品因时间问题没有来得及发运,另有一种正在制作之中,并作简单的可行性分析。德纳罗档案中,金登干提供的图片基本可以认定为赫德认可的设计定稿。

1877年6月德纳罗出具的42页长篇报告中,随函寄奉了12份附件,德纳罗档案中仅存了其中一份复印件。结合报告的内容及留存他处的资料,《德纳罗密档》整理出了德纳罗为海关所设计的几种设计图稿:邮资信封、圆和椭圆两种邮资信封邮资符、太极阴阳图水印图和横竖双向长方形邮票图稿。在邮票的颜色选择上,德纳罗公司指出“黄色,御用之色;红色和粉色,欣悦;蓝色,哀伤;绿色,欣悦;棕色,哀伤”,并在所设计的邮票设计图稿的“英国方案”时,选用了黄色、红色和绿色,并将“御用之色”的黄色用于最高面值。有趣的是,在“英国方案”无疾而终后,海关印制邮票回归到“中国方案”时,也是采用了这三种颜色,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与德纳罗的建议相关?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不久,毛泽东旧居挂起了门匾。毛泽东的族兄、塾师、也是“韶山一支笔”的毛宇居,为此匾书写了题字。

1878年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买下上屋场东边的五间茅草屋,1888年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携儿子毛顺生、儿媳妇女氏迁居于此。后来毛家几代人对此历经几十年的改建和扩建,到1918年房屋架构基本定型。1919年10月、1920年1月,毛泽东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故乡,动员弟弟妹妹“舍小家为大家”参加革命。不久,毛泽民和妻朱淑兰处理了家产,离家走上革命道路。此后,上屋场由当地农民居住。1929年,毛泽东旧居被国民党政府没收后继续出租给当地村民居住。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政府安排韶山村老党员、毛泽东族叔毛月秋负责旧居管理和接待来访者的工作。当时,毛泽东旧居不仅十分简陋,仅有大大小小13间半房屋,而且还未收集过什么文物,屋里没有毛泽东家人的照片不说,门口更无起码的标志物即一块门匾。

湘潭县委委员毛华初在参观时对毛月秋提议:“老书记,以后到这里参观的人会越来越多,您看屋前是不是该写个门匾?”毛月秋深以为然。

讨论匾上内容时,毛月秋请毛华初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毛华初沉吟片刻,不好意思地说:“我肚子里没什么墨水,说不好。随军南下到处都见解放了的老百姓举着毛主席的像游行,上面都写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照此,上屋场的门匾就写‘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不知行不行?”大家听了都表示赞同。

刘少奇的话一说完,他们大吃一惊,没想到一字之差,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旧居管理人员认真地对刘少奇的意思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并逐层向上级汇报。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下文同意将“毛泽东同志故居”改为“毛泽东同志旧居”。196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为旧居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旧居”的匾额。从此,“故居”改为了“旧居”,此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摘自北京晚报)

毛泽东故居曾四易题匾

湖南韶山是毛泽东家乡。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前往参观瞻仰。从他的塾师为毛泽东故居第一次题匾,到邓小平重书第四块门匾,毛泽东故居门匾背后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第一块 “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

1878年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买下上屋场东边的五间茅草屋,1888年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携儿子毛顺生、儿媳妇女氏迁居于此。后来毛家几代人对此历经几十年的改建和扩建,到1918年房屋架构基本定型。1919年10月、1920年1月,毛泽东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故乡,动员弟弟妹妹“舍小家为大家”参加革命。不久,毛泽民和妻朱淑兰处理了家产,离家走上革命道路。此后,上屋场由当地农民居住。1929年,毛泽东旧居被国民党政府没收后继续出租给当地村民居住。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政府安排韶山村老党员、毛泽东族叔毛月秋负责旧居管理和接待来访者的工作。当时,毛泽东旧居不仅十分简陋,仅有大大小小13间半房屋,而且还未收集过什么文物,屋里没有毛泽东家人的照片不说,门口更无起码的标志物即一块门匾。

湘潭县委委员毛华初在参观时对毛月秋提议:“老书记,以后到这里参观的人会越来越多,您看屋前是不是该写个门匾?”毛月秋深以为然。

讨论匾上内容时,毛月秋请毛华初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毛华初沉吟片刻,不好意思地说:“我肚子里没什么墨水,说不好。随军南下到处都见解放了的老百姓举着毛主席的像游行,上面都写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照此,上屋场的门匾就写‘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不知行不行?”大家听了都表示赞同。

不久,毛泽东旧居挂起了门匾。毛泽东的族兄、塾师、也是“韶山一支笔”的毛宇居,为此匾书写了题字。

刘少奇的话一说完,他们大吃一惊,没想到一字之差,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旧居管理人员认真地对刘少奇的意思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并逐层向上级汇报。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下文同意将“毛泽东同志故居”改为“毛泽东同志旧居”。196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为旧居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旧居”的匾额。从此,“故居”改为了“旧居”,此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第二块 毛泽东说“‘伟大’两字不是封的”

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旧居接待了第一批国际友人即苏联电影代表团。同年5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代表父亲回乡,参观父辈的旧居。1952年,韶山乡政府自作主张对毛泽东旧居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整修,本来还准备再修条路,毛泽东知道后坚决阻止。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来自家乡的亲友时,毛月秋提起了三年前苏联摄影师参观旧居的事情。毛月秋又告诉毛泽东,苏联和民主德国客人看到上屋场上挂的“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的匾,都说好。

毛泽东却连声说:“这个不妥,不妥。‘伟大’两字不是封的,我不敢当,哪里会一写伟大就伟大呢?我建议换一个门匾。”毛泽东的意见带回去后,已由湘阴县调任湘潭县委书记的华国锋为此召集县委干部召开几次会,根据毛泽东的“批评”,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建议并经过几次讨论后,决定把第一块门匾撤换掉。随即,湘潭县委上报湖南省委批准后,1955年3月,第二块门匾“毛泽东同志故居”挂在了上屋场。

1955年5月29日,徐特立从长沙专程到毛泽东家乡韶山参观。发现旧门匾被换了,他对毛月秋说:“毛主席又走在我们前面了。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伟大也不能天天挂在嘴边、贴在墙上,这个不能靠宣传,要靠人民的拥护、历史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故居现在的门匾好。人民把主席尊为伟大领袖,主席却始终认定自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名同志。这既尊重了毛主席本人的意愿,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而‘故居’两字也是古人说的旧居的意思,典雅朴实,平凡中体现了伟大。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实现民族解放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旗手。”

第三块 刘少奇提议改“故居”为“旧居”

1961年3月14日至23日,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农村六十条》后,归途中刘少奇回乡附近搞调研,直接了解农民对《农村六十条》的意见。

1961年4月1日,刘少奇到达长沙后,并没有直接回炭子冲老家。4月2日,他来到距炭子冲只隔十多里的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在生产队养猪场一间破旧空房里,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一起住了6天。在这6天里,刘少奇听取了先期到达的中央调查组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亲自到四周农家了解群众对食堂、分配、住房等各方面意见,接待了宁乡一拨又一拨的乡民,认真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4月8日下午,刘少奇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故乡,在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陪同下前往韶山冲。

4月9日晨,刘少奇来到韶山冲参观。他凝视着“毛泽东同志故居”几个大字,沉思一会儿后指了指门匾,轻声问工作人员:“你们知道这个门匾是谁提议写的吗?”他们摇摇头。

刘少奇缓缓说道:“毛泽东同志故居的‘故’字有‘过去’和‘去世’两种意思。我们的毛主席身体很健康,应当把‘故’字改为‘旧’字。”显然,他这个眼光和理解是依循新社会的新常理新用法之见。

刘少奇的话一说完,他们大吃一惊,没想到一字之差,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旧居管理人员认真地对刘少奇的意思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并逐层向上级汇报。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下文同意将“毛泽东同志故居”改为“毛泽东同志旧居”。196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为旧居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旧居”的匾额。从此,“故居”改为了“旧居”,此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第四块 邓小平题写匾悬挂至今

1973年10月,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结束了陪同加拿大总理访问郑州、桂林等地的工作任务后,特意取道湖南长沙来到韶山。

19日,邓小平在湖南省委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旧居,还没进门就说:“我早就想来。1965年有这个念头,当时太忙了,1966年我想来也来不了。”参观完旧居,韶山方面希望邓小平合影留念。省委领导要韶山方面直接询问他。于是,一位工作人员带着试探性的口气问:“小平同志,您是第一次来到韶山,照不照张相啊?”

“照,当然要照!”邓小平抚了抚中灰色的中山装,挺起胸膛,和一群湖南本土穿着旧军装、中山装的人们,在“毛泽东同志旧居”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珍贵的相片,现在陈列在毛泽东纪念馆。

1983年,时值毛泽东诞辰90周年,韶山管理局派人到北京,请邓小平题写故居和纪念馆的匾额。4月2日,邓小平几易其稿,挥毫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故居”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两块匾额。

如今,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用的就是邓小平的题字。

(摘自党史文汇)